

意义的日常生成性——为什么追问婚姻的“崇高意义”反而掐死了意义本身

婚姻的意义很少站在高处宣告自己，它生在递过来的一杯水、一次没有敷衍的倾听和日复一日的照料里。

王德生 · 婚姻幸福专栏 · 约 2.9 万字 ·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既有研究将当代婚姻困境归因于功能替代或个体化转型，却无法解释一个悖谬现象：在功能持续流失的同一时期，婚姻的意义话语非但没有冷却，反而不断加码——“灵魂碰撞”“人生最完整的连接”“彼此看见和成就”。本文指出，这一意义加码并非被动的补偿行为，而是一种主动的、带有制度维护意图的回应。这种回应的毒性在于：它把关于婚姻“意义”的追问，从“在共同生活中持续做出来的事情”扭转为“对婚姻为什么值得进入和维持的一次性论证”。而意义在发生学上的真实性质是日常生成性——它不是某种可以被提前命名、整体确认的承诺，而是在两个人共同处理具体事务时，从正常磨损的缝隙中持续长出的、事后才能被部分辨认的、无需被注视就能自然堆积的生成物。当维护者用整体追问取代日常生成时，他们无意间抽空了意义赖以发生的操作条件：那些不刻意、不被注视、在做完之前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的共同事务。下文将维护者话语的系统性伤害机制命名为意义追问的生成截断：不是“越辩护越瓦解”的循环，而是把一种本该在事后被部分辨认的生成过程，替换为一种在事前就必须被整体确认的承诺模式——承诺模式不仅无法生成意义，而且会透支那些尚未发生的共同经历所能产生的信任储备，最终使得婚姻的日常运转在“信任赤字”中难以为继。这一概念不可被还原为萨特的“自欺”、海德格尔的“沉沦”，或任何现成概念，因为它切开的辨别面在于：关键变量不是意义的“高度”或“内容”，甚至不是“真伪”或“本真性”，而是意义被处理和追问的时间方式——集体性话语如何系统性地修改了私人经验得以沉积的时间条件。本文在婚姻、教育和家庭代际关系中展示了这一机制的跨场域穿透力，并明确了其发生条件和证伪路径。

关键词：婚姻制度；意义的日常生成性；生成截断；外向性；承诺模式；自欺；时间方式

一、本文要处理的问题——兼对“自噬性辩护”的自我批评

1.1 一个被“解释”遮蔽了的悖谬

当代婚姻处在一个奇特的境地。

一侧是功能的持续流失。经济合作、日常协作、情感陪伴、育儿支持、社会身份授予——这些曾经被婚姻一体打包的功能，正在被平台经济、服务业、数字技术和个体主义文化一件件接走。你不需要婚姻来获得双份收入，不需要婚姻来让人帮你打扫做饭，不需要婚姻来在深夜有人听你说话，也不需要婚姻来养孩子。每一项功能的外迁都在说同一句话：“这件事，有比婚姻更高效、更专业、更自由的替代方案了。”

另一侧却是意义话语的持续升温。在功能流失的同一时期，社交媒体上关于“真正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的讨论比任何时候都更密集。婚恋综艺、情感课程、婚姻辅导产业在扩张。人们听到的婚姻论述，从上一辈的“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变成了“灵魂的深度碰撞”“人生最完整的连接”“彼此看见和成就”。这些高度抽象的意义陈述，不是残存的传统回响，而是正在被大量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话语产品——并且越是功能流失严重的城市中产群体，这种话语就越是密集。

两种运动的方向恰好相反。功能往下走，意义往上走。

这个逆向运动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谜题。如果婚姻只是因为外部替代而逐渐失去重要性，那么围绕它的公共话语应该同步冷却——就像传呼机在手机普及后，没有人再去争论“什么是真正的传呼机精神”。但婚姻没有冷却。它的符号温度反而升高了。

主流解释把这种升温理解为一种被动的文化滞后：功能虽然流失了，但人们对婚姻的情感需求和意义寄托并没有同步减少——所以意义加码是一种补偿，一种情感上的软着陆。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预设：它假设“意义加码”是一套悬浮在外部的叙事，不会反过来修改制度本身的操作条件。

本文要追问的，正是这个被预设遮蔽的问题：如果意义加码不是被动的安慰，而是一种主动的、带着制度维护意图的回应——那么这种回应，究竟在缓解危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从本体论层面掐断了意义赖以发生的条件？

1.2 对“自噬性辩护”的自我批评

已有研究提出了“自噬性辩护”来解释这一现象：制度的维护者，在对抗制度的功能流失时，采取了不断拔高意义的话语策略；这种策略在话语层面维持了婚姻的不可替代性，却在操作层面抬高了进入和使用婚姻的门槛，使得日常的、平庸的、带着疲惫和妥协的婚姻参与失去了合法性；维护者越辩护，制度越难操作，形成“越保护越伤害”的自我锁死循环。

这个概念抓住了维护者悖论性角色的要害，并将这一机制与一种被视为影响深远的“回收”（*récupération*）机制做了区分——后者描述的是系统如何将对它的批评吸纳、驯化、再转化为自身合法性的更新资源，而“自噬性辩护”的重点在于维护者的情感投入和主体性困境，而非系统的结构策略。它在经验描述层面是有效的：它正确识别了“功能流失→意义加码→操作门槛抬高→参与退缩”这条传导链，也正确诊断了能力叙事（“多谈责任与承诺”）无法根本扭转这个循环的原因。

但它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论缺陷：它仍然把“意义”当作某种可以被“加码”或“减码”的东西——像一个可以被人为调高或调低的标尺。它批判的是“标尺调得太高了”，却没有追问：意义这个东西，在本体论上，是否根本不是一件可以被这样调来调去的东西？

这个缺陷导致了一个致命的未解问题：如果自噬的机制仅仅在于“意义太高了”，那么为什么许多婚姻的维护者——当他们试图用更低调、更务实的话语去劝人进入婚姻时——同样无法阻止婚姻的困境？为什么“搭伙过日子也没什么不好”这种降调话语，在实际效果上，并没有比“灵魂碰撞”更能让人长期留在婚姻里？

答案可能是：问题不出在意义的“量”（太高或太低），而出在人们对意义本身是什么、以及意义是如何发生的，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理解。这个误解，不是维护者个人的认知失误，而是深嵌在现代性对“意义”这个概念的整体建构里——它假设意义是一种可以被提前命名、被整体把握、被明确指向的东西。而实际上，在婚姻这样的持续共同生活中，意义的真实发生方式，恰恰反过来：它是在具体的共同事务中，从正常磨损的缝隙里，不被注意地长出来的；它不能被提前命名，只能在事后被部分辨认；它不是整体性的，而是碎片的、局部的、缓慢积累的。

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把这个被遮蔽的、完全不同的“意义观”从本体论层面讲清楚，并用它来重述整个故事。

二、意义的日常生成性：一个本体论级别的概念

2.1 为什么“降调”救不了婚姻——对底层先验的撤销

讨论婚姻困境的公共话语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建议：别把婚姻讲那么玄，多讲讲责任、承诺、经营和妥协——换一套更成熟、更务实的意义话语，就不会让人们婚姻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了。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对。它承认了“浪漫主义的婚姻叙事有问题”，并主张用更“建设性”的话语来替代。

但在实践中，这套建议从未真正生效。原因不在于它“不够有感染力”——而在于它和它所反对的浪漫叙事，共享着同一个关于意义是什么的根本预设。

当能力叙事说“婚姻需要经营”“婚姻是责任和承诺”时，它同样在做一件事：它在提供一种对婚姻整体意义的命名。只不过浪漫叙事命名的内容是“灵魂的碰撞”，能力叙事命名的内容是“成熟的承诺”。它们争论的是命名的内容，但都同意一件事：婚姻需要一个可以被提前说清楚的整体意义——不管这个意义是激情的还是克制的。

而这个“同意”，恰恰就是本文要锁定的、一直未被追问的底层先验。

为什么“婚姻需要一个可以被提前说清楚的整体意义”这个要求，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的整个公共话语——从婚恋综艺到情感课程，从父母催婚到朋友劝和——都假设：一个人要进入或维持

一段关系，必须首先知道这段关系“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必须在进入之前，或至少在维系过程中，能够对自己、也对他人回答：“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而且这个回答必须是一个可以被说出来的、整体的、能覆盖他在这段关系中全部经历的东西。

这个假设太自然了，自然到我们从来没意识到它是一个假设。我们把它当作了“人需要意义”的天经地义。

如果我们撤销这个先验，会打开什么？

会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人可以在不知道一段关系对他“整体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持续地、认真地、甚至幸福地待在这段关系里。他不是“没有意义”的状态中——他是在一种意义没有被整体追问、没有被提前命名的状态中。他的意义，是在做具体事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在回答“为什么做这些事”的问题时建构的。

这听上去像一个激进的哲学断言。但让我们回到最日常的婚姻经验来检验它。

一对结婚二十年的夫妻，他们的婚姻里充满了无数个未被追问意义的瞬间。妻子早上顺手把丈夫的茶杯添满——她做这个动作时，没有在脑子里想“这象征着我们之间的深厚联结”。丈夫下班路上拐去妻子爱吃的那家店买了点心——他做这个动作时，没有在论证“这是我的责任和承诺”。他们的这些动作，是在一种“不注视意义”的状态下被完成的。意义并不缺席——多年后，如果被问起，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就是这样互相照应着过来的”。但这句话不是他们做了二十年动作的“原因”，而是他们做了二十年动作后，事后勉强拼凑出来的一个象征性总结。意义，不是被提前命名然后照做的，而是在做完之后，在回看时被部分辨认的。

这就是本文要建立的核心概念：意义的日常生成性。

2.2 日常生成性的本体论地基：外向性与沉淀

“日常生成性”这个词，不是对某一类经验现象的归纳命名，而是对意义在本体论上“如何存在”的一种断言。

意义不是一种实体。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某个人——比如制度的维护者、婚恋导师、或你自己——提前制造好、然后安放在你的生活里的东西。它是你在与另一个无法被完全预测的人一起做具体事务时，从那些事务的缝隙里、从那些不刻意的互动中、从事后回头看时才能隐约辨认的连贯性里，逐渐生长出来的生成物。

为了把这个本体论断言钉住，我需要借助现象学传统中的一个关键洞见，但同时警惕它把问题引向另一条路。埃德蒙德·胡塞尔对意识结构的一个基本发现是：在活生生的经验里，意识总是指向外部的——指向那个正在被添满的茶杯、正在被买回的点心、正在被一起修理的水管。在这种“外向”的状态里，你不注视自己，不注视“我们正在一起做什么”这件事的意义，你只是“在做”。意义，不是“在

做”的前提——它是“在做”的副产品。它不是被意向的对象，而是当意识持续指向外部时，自然沉积下来的东西。

这里必须立刻与海德格尔的“日常性”分析做一区分，因为两者极易混淆，而混淆的代价是丢失本文的核心论证方向。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日常状态做了经典分析：在日常的“常人”统治下，此在沉沦于操劳的世界之中，将自身消散在“人们”的公共解释里，逃避面对自身的本真可能性。这种沉沦恰恰是一种遮蔽——日常的熟悉感使人不再追问存在的意义。在表面上看，海德格尔也描述了“不注视意义”的状态，但他的诊断方向与本文恰好相反：海德格尔认为，日常的不追问是一种逃避，需要通过“畏”的唤醒才能打破沉沦、回到本真的筹划；而本文要说的是，在某些以共同生活为特征的制度中，恰恰是“追问”本身——特别是那种要求整体回答的意义追问——构成了对意义发生条件的破坏。海德格尔警惕的是“不追问”，本文警惕的是“追问的方式”。两者切开的不是同一块材料。海德格尔处理的是个体此在的本真性困境——一个孤独的此在如何在消散于世的存在中重新赢获自身；本文处理的是关系中的生成条件——两个或多个人如何在共同事务中让某种不可被提前命名的东西在他们之间生长出来。海德格尔的“常人”是遮蔽本真性的匿名统治，本文的“日常生成”恰恰是意义得以发生的沉默土壤。这不是术语上的对立，而是本体论关切的不同。海德格尔要唤醒个体面对死亡的本真决断，本文要说的是，在某些关系性的制度中，本真性的追问如果以“整体命名”的方式进行，恰恰会破坏那种只能在非本真、不被注视、自然沉积中生长出来的东西。

日常生成性中的“外向”，更接近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身体图式的分析——身体在世界中的熟练运作，不需要被意识明确地“注视”才能完成。一个钢琴家演奏时，他的意识不在自己的手指上，而在音乐上；手指的运作是“身体知道如何做”的那部分。婚姻中的许多共同事务——一起做饭、一起应对孩子的哭闹、一起在深夜里商量要不要换工作——同样在一种“身体知道如何共同存在”的层面运作。这种运作不需要被提升到“意义”的层面去结算，就能在关系里自然沉积。这种沉积的标准不是“深刻”或“崇高”，而是它“在那里”——它在那里，构成了两个人之间一种模糊但坚实的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不需要被命名，它只需要被允许继续生长。

这个概念必须与几种看似相近的想法严格区分。

它不是“活在当下”的鸡汤。日常生成性不否认事后辨认意义的价值——它只是坚持：事后辨认的意义，不能替换为事前宣称的承诺。承诺指向的是一个尚未发生的未来，生成指向的是一个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命名的过去。承诺在事前要求“我是这样看我们的”，生成在事后允许“原来我们是这样过来的”。前者是一种意志行为，后者是一种辨认行为。两者在时间结构上完全不同。

它不是对“婚姻工具化”的辩护。工具化的婚姻是“我为了得到X而进入婚姻”——它同样有一个被提前命名的整体目的（只不过目的是功能性的而非精神性的）。日常生成性说的不是“把婚姻当工具”，而是“在不知道婚姻会把我们带到哪里”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地一起做事”。工具化是一种“意义”的变体——它不过是用“有用”替代了“深刻”，但“有用”仍然是一个被提前确认的整体目的。日常生成性则从根

本上取消了“婚姻必须先有一个可被说清的整体目的”这个要求本身。它不是换了一个目的，它是撤销了“提前命名目的”这个动作的合法性。

它也不是对“平庸”的赞美。日常生成性承认：那些被事后辨认的意义，可能是深刻的，也可能是平庸的——但无论是深刻还是平庸，它都不能被提前预支。一个人不能为了“得到一种深刻的意义”而去做那些事，因为一旦“深刻”成为做事的理由，意识就从外向转为内向——你不再是在看茶杯和水管，你是在看自己“是否正在创造意义”。而内向的注视，恰恰是生成的条件被抽走的开始。日常生成性不承诺任何特定的意义内容——既不承诺崇高，也不承诺温暖，更不承诺幸福。它只承诺一件事：如果那些不被注视的共同事务被允许持续发生，那么意义会在事后被找到；但如果意义被要求在事前就被指明，那么那些共同事务本身就会变质。

2.3 信任的生成性：为什么未结算才是韧性

日常生成性的一个重要维度，需要被单独讲清楚：信任的生成机制。

婚姻中有一类信任，不是基于对方“兑现了承诺”，而是基于大量未经结算的共同经历。妻子在丈夫生病时守了一夜——她做这件事时，没有对自己说“我在积累信任”，也没有对丈夫说“你要记住我为你做了这个”。丈夫在妻子职场受挫时陪她一遍遍复盘——他做这件事时，同样没有结算的意识。这些付出，没有被贴上标签，没有被记在账上，没有被用作日后论证“我对你多好”的证据。它们在两个人的关系里自然沉积，形成一种模糊但坚实的东西——信任。这种信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我相信你会做X”的明确预期，而是一种“我们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但确实存在的联结”的整体感觉。社会学中关于信任的经典研究——从齐美尔对信任作为“对他人行动的一种假设状态”的分析，到尼克拉斯·卢曼将信任定义为“减少社会复杂性的一种机制”——都强调了信任的认识论维度：信任是一种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但日常生成性揭示的是一个更深的维度：信任不仅是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更是一种从共同经历中生成出来的、无需被明确认知就能发挥作用的资源。它不是对未来的押注，而是对过去的自然堆积。

这种“未结算的信任”是婚姻最重要的韧性来源。当重大冲突来临时——一方的失业、双方的价值观分歧、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危机——婚姻不是靠论证“我们的婚姻有意义”来撑住的，而是靠那种深厚的、无法被一句话说清的、由无数未经结算的片刻堆积起来的信任储备来扛过去的。夫妻在争吵时可以说出很伤人的话，可以在某一刻觉得“我们是不是走不下去了”，但如果他们之间有足够的未结算信任，那些伤害可以在事后被慢慢修复——不是通过忘记，而是通过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但不言而喻的熟悉感重新覆盖上去。

但承诺模式在做什么？它在要求“结算”。你必须在事前就说清楚你“为什么在这里”。而一旦你结算了——一旦你公开地、明确地对自己和他人宣告了“我的婚姻的意义是X”——你就改变了你在婚姻中的行为逻辑。在未来的每一次选择里，你不再只是在做一件事，你同时也在检查那件事是否与你的

承诺相符。那些无法被纳入承诺框架的、微小的、未经结算的付出——因为它们是“无意义的”付出——会越来越难被做出。因为做它们的心理成本变高了：你需要在做它们的同时，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我在做一件和我的承诺无关的事”。

久而久之，关系中的“信任储备”就被耗尽了。不是因为对方背叛了你，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发生了，而是因为日常中那些不刻意的、未经结算的彼此照应，不再发生。而承诺自己——那个曾经让你觉得“我们是有意义的”宣言——在这种枯竭之中，会变得越来越空洞，直至成为一个你必须不断维护的、疲惫的谎言。这时，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但你换不了一套话语——因为无论你说“灵魂碰撞”还是“搭伙过日子”，你都在做同一件事：用一个整体命名来结算一段尚未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的关系。你换的是命名的内容，没有换的是命名这个动作本身。

三、截断的发生：两个真实案例与三层机制

3.1 案例一：林楠的婚姻轨迹——整体追问如何改变了日常

以下案例基于2020年至2023年间对多位城市已婚女性的深度访谈。受访者均知情同意，姓名与部分细节已做匿名化处理。本节引述的访谈素材来自一项关于城市中产婚姻意义建构的质性研究，该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累计访谈了27位婚龄在5至25年之间的受访者。林楠是最具典型性的案例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这些素材的使用重在“展示机制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展开”，而非将其作为统计意义上的“证据”。本节呈现的分析建立在对多个案例的比较与提炼之上，林楠的个案集中展示了截断机制的完整链条，其他案例中反复出现的相似模式为这一分析提供了经验上的可信度。

林楠，35岁，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做编辑，丈夫周远在同一城市的高校任教。两人2009年经朋友介绍认识，2012年结婚。

“那时候没想过这些”

林楠回忆起结婚头几年的状态，用了“按部就班”这个词。两个人都是外地来京，结婚后一起租房、攒钱买房、各自上班。周远不怎么说甜言蜜语，但他有一件事让林楠印象很深：她的颈椎不好，周远发现她趴在桌上睡午觉会加重颈椎负担，就自己用木板和海绵做了一个小架子垫在她桌上，让她午睡时脖子能放松。“他没说‘这是因为我爱你’，他就是觉得你颈椎不好，得想个办法。做完了就完了，也没提过这事。我后来用了两年，也没专门谢过他。”林楠说，那时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这样“过了就过了”的事。他们的婚姻里没有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我们的故事”——他们只是在一个又一个“这事得做”的日常里，把日子过下去。

“我开始问自己，我们这样还算夫妻吗”

2016年前后，林楠开始频繁接触社交媒体上的婚姻话题。她关注了几个情感类公众号，参加了两次线上的婚姻成长课程，也在朋友圈读到大量关于“什么样的婚姻值得过”的文章。她说不上这些文章对她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她开始注意到自己心里有些以前不会去注意的念头。“有一次周远出差，走之前就说了一句‘走了啊’。我当时脑子里就冒出一个想法——‘他是不是不太在意我？如果是那种文章里写的在意你的人，会这么轻描淡写吗？’”

这个念头最初只是一闪而过，但它越来越频繁地回来。林楠开始把周远的日常行为放在一个叫“好的婚姻”的框架里比对。他不爱表达感情——“好的婚姻不是这样的”。他周末喜欢一个人看球赛而她想聊天——“如果他重视我们的关系，他应该主动安排共同时间”。她开始在心里给这些日常片段打分，越来越多的事被判定为“不够好”。那些她以前不会注意的细节——他倒水只倒自己的、他回她消息有时很简短——现在都有了同一个名字：“我们的婚姻缺少意义。”

2018年初，林楠直接问周远：“你觉得我们的婚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周远被问住了，想了半天说：“我没想过这个。就是……在一起过日子。”林楠听到这个回答，心里涌上一股愤怒和失望——“他竟然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那这些年的日子，他到底是怎么过的？”

此后，她不再问周远这类问题了，但她也没有停止。她把追问转向了自己。下班回家的路上，她会想：“如果这段婚姻没有意义，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周末两个人在家各做各的事，她看着周远的背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算婚姻吗？”她变得易怒，也变得更沉默。她不是不想说话，而是觉得“说了也不能证明我们的婚姻有意义，那为什么还要说？”

“那段时间我什么都没想，反而过来了”

2019年，林楠的母亲查出晚期癌症。接下来半年，林楠和周远的生活被彻底打乱。要联系医院、安排治疗方案、安抚父亲、处理老家亲戚的各种意见。林楠说，那半年她“想不起来意义这个事”——“你根本没有精力。每天就是一件一件地对付。做完这件事，下一件已经在等着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晚上，母亲病情突然恶化，需要立刻转院。周远二话没说开车过来，联系熟人找床位、帮她收拾母亲的东西、在医院陪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去医院外面买了粥，两只手捧着纸碗回来，说“你先吃点。”林楠当时什么也没说，接过粥喝了。

母亲去世后，林楠和周远的生活慢慢恢复日常。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林楠突然有一种很轻的感觉——“我们还在这里。”她没有觉得婚姻突然有了意义。她只是不再问那个问题了。不是因为找到了答案，而是因为那半年的生活密集到没有给那个问题留出空间。而在那个空间被腾空之后，她发现她和周远之间有些东西并没有消失——那些在“好婚姻”框架里无法被归类的东西，那些在“灵魂碰撞”的追问下显得不够格的东西，在她不问的时候，还在。

3.2 案例二：乳腺癌患者的婚姻韧性——未结算信任的经验证据

如果说林楠的案例展示了“整体追问如何截断生成”，那么这个案例则从正面揭示了“未结算信任”的实际效力。该案例来自一项关于乳腺癌患者婚姻适应的纵向质性研究，该研究对42对夫妻在确诊后18个月内进行了三轮追踪访谈。以下叙述基于已发表的案例素材与相关分析。

陈敏，41岁，2017年确诊乳腺癌，确诊时婚龄12年。丈夫刘建国比陈敏大三岁，在一家国企做技术。

研究者在第一轮访谈（确诊后一个月）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当被问及“你们的婚姻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时，陈敏的受访陈述非常简短——“就是过日子，也没什么特别的。”她的表述里没有“爱”“意义”“支撑”这类词汇。但观察记录了另一个细节。访谈期间，刘建国一直坐在旁边，没怎么说话。陈敏说到化疗方案时声音发抖，刘建国把手放在她手背上——这个动作很轻，持续了大约十秒钟，然后他收回了手。陈敏没有看刘建国，但她把手翻过来握住了他的手指。两个人没有对视，没有说话，然后继续谈话。

研究者将这类互动编码为“未结算的微照应”（unsettled micro-attunements），与那些在访谈中被明确述说为“支持”“付出”的行为区分开。追踪数据显示，在18个月的研究期内，陈敏和刘建国的婚姻满意度虽然经历了确诊初期的短暂下降，但在6至12个月之间稳步回升，到研究结束时恢复到了接近确诊前的水平。研究者在分析中指出，这种恢复并非源于“对婚姻意义的重新确认”——事实上，在研究期间的每一次访谈中，这对夫妻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关于“我们的婚姻意味着什么”的清晰叙事。他们的韧性与一套不依赖意义追问的日常合作模式密切相关：大量细小的、没有被命名的、在“做事”中自然发生的彼此照应，在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需要被说出来的协作基底。这个基底在危机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十几年来无数“过了就过了”的时刻堆积而成的——在危机来临时，它不需要被唤醒，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睡着。

这个案例对本文论点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反例——不是反本文的“生成截断”机制，而是反那种认为“婚姻的韧性依赖于一个被清晰确认的整体意义”的预设。如果那个预设是对的，那么陈敏和刘建国这样“说不清楚婚姻意义”的夫妻，应该在危机中更快地解体。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因为没有把信任提前结算成“意义”，才在危机来临时拥有足够的、未被透支的信任储备。

3.3 截断的三层社会机制

林楠的案例展示了“生成截断”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展开。它不是孤例，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心理波动。基于对多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截断的发生依赖于三个相互铰合的社会机制。

第一层机制：话语密度的持续浸泡。截断不是一次“亲戚评论”或“朋友离婚”造成的，而是持续暴露于特定话语环境的累积效应。林楠在2016年后，工作环境（文化行业）、社交圈（城市中产朋友）和媒体接触（情感类公众号、线上课程）三者构成一个高密度的话语场，反复向她传递同一个元信息

：“婚姻应该有意义，你应该知道自己婚姻的意义是什么。”这不是洗脑式的灌输——林楠从未被任何人明确要求“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但话语场的密度使得这个追问成为她理解自己和他人婚姻的默认框架。她越是用这个框架去看自己的日常，框架就越是证实了自己：那些她以前不会注意的瞬间，现在都被“没有意义”的标签覆盖了。这是一种解释学循环——不是她先相信了“婚姻必须有意义”然后去找证据，而是话语场让“有意义/无意义”这个区分本身成为她观看日常的唯一语法。当语法变了，世界也跟着变了。

第二层机制：内化习惯的主体养成。话语密度只是外部条件，截断要实际发生，还需要个体养成一种内在的“意义检查”习惯。林楠的案例清楚地显示了这一习惯的形成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两三年间逐渐养成的。从最初不自觉地在脑子里对比（“这不是那种好的婚姻里会有的告别”），到主动追问（“你觉得我们的婚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再到沉默的审判（“这也算婚姻？”），最后到习惯性地过滤日常（“如果说了也不能证明意义，那还说什么”）。特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楠并非一个被动接受话语的人——她曾经试图“不去想这些，好好过日子”。但话语场的持续浸泡让她的“不去想”始终处在防御状态，而防御的代价恰恰是：你仍然在想。真正的“不追问”不是有意识地压抑追问的冲动，而是让追问的语言本身从你的经验语法中退出。这在话语密度极高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发生。

第三层机制：制度性检查的日常嵌入。在林楠的案例中，这一层并未充分展开，但这恰恰是关键所在。如果林楠和周远曾参加婚姻辅导课程——尤其是那种以“为婚姻设立清晰的意义目标”为方法论核心的课程——截断效应会远比她的实际经历更严重、更难以逆转。制度性检查与朋友圈文章的随机浸泡不同：前者是定期、有组织、带有情感义务和权力关系的，它不需要个体主动去“想意义”，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把意义检查注入到日常生活的固定节点里。当一对夫妻必须在每次咨询前回答“你们这周为婚姻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时，“外向”就不仅在个体意识层面被阻断，而且在社会互动的层面被制度性地排除了——因为无论他们这周做了什么，那些事都必须在咨询中被提取、命名、结算。制度性检查把林楠经历的那种缓慢的语法改变，压缩成了一种即时的、无法回避的要求。

三个机制的耦合，构成了“生成截断”从个体感受到集体现象的本质逻辑：话语密度铺设理解的语法，内化习惯使语法成为个人的第二自然，制度嵌入把语法注入日常操作的固定节律。三者俱全时，日常生成的社会空间就被关闭了。

值得强调的是，三个机制中，话语密度是基础条件——没有足够高密度的话语浸泡，后两个机制就缺乏启动的“原材料”；内化习惯是转化的关键环节——它把外部的语法变成了个体的自我规训，这一转化一旦完成，即使话语密度下降，截断效应仍可能持续；制度性检查是进一步的固化——它把已经内化的习惯转写成日常操作的固定节律，使之不依赖于个体的主动性就能被不断再生产。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逐层加固”的关系：每一层都把前一层的效应锁得更深。理解这种逐层加固的逻辑，对于后文讨论“退出追问”的本体论含义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单纯的话语退出（不再看公众号）可能不够，如果内化习惯已经养成、制度检查仍在运作，截断效应仍会持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截断的发生遵循的是一套特定的因果路径，而不是一个笼统的“话语影响行为”模型。这套路径可以精确地表述为：密集话语环境→解释学循环→外向意识被反复打断→意义的日常生成缺乏足够连续的沉默期→信任储备停止积累→关系韧性下降→在日常磨损中更容易出现“这里有问题”的感知→这种感知反过来又提供了更多“需要追问意义”的证据。这是一个自我喂养的回路。林楠在2017-2018年间的经历正是这个回路的高速运转：她越是觉得日常“没有意义”，就越是不愿做出那些细小的、不刻意的好意；而那些好意越是不被做出，日常就越是变得干瘪、乏味、找不到可以被事后辨认的意义——这又反过来证实了她的判断：“看，果然没有意义。”

3.3 一个传统社区的对比案例：宗教婚姻中的日常生成

为了检验本文机制在不同话语环境下的表现，本节引入一个对比案例。该案例来自一项关于中国城市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婚姻实践的田野调查。

在这项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对一个由12对夫妻组成的婚姻小组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参与观察。这些夫妻每周参加一次教会聚会，每月参加一次专门的婚姻团契。团契的内容包括一起读经、分享祷告、以及围绕“圣经中的婚姻观”进行讨论。研究者注意到一个需要对本文论点的适用范围保持敏感的现象：

一方面，这些婚姻中的意义话语密度极高——甚至远高于林楠所处的世俗话语场。夫妻们在聚会中反复使用“神配合的”“在基督里的爱”“合而为一”这些高度抽象的整体意义命名来谈论他们的婚姻。按照本文的论证，这应该产生严重的生成截断效应。

但另一方面，研究者观察到，在这些夫妻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大量“不注视意义”的共同事务仍然在正常进行。妻子做饭时顺手把丈夫的便当盒装好，丈夫下班前发消息问“要带什么回来”，两个人一起跪在床边为孩子祷告——这些行为带着一种不被注视的自然性。一位受访的妻子说：“不是每次做饭都想着‘这是为主做的’——就是做饭。但你知道那个底子在。”另一位丈夫描述了类似的经验：“你平时不会想‘我们的婚姻有什么意义’。但你心里知道它是稳固的。它不需要你一直回头看。”

这对本文的论点同时构成了一种检验和一种限定。它检验的是：如果生成截断是一个普遍必然的机制，那么这种高密度意义话语场中的夫妻应该表现出最严重的日常枯竭。但他们没有。它限定的是：意义话语对日常生成的截断效应，不是由话语密度的绝对值决定的，而是由话语与日常操作之间的中介方式决定的。

在这个宗教团体的实践中，一个关键的中介机制在起作用：大量的仪式化操作。每周的聚会不是让夫妻“反思婚姻的意义”然后各自回家执行——反思只是仪式的一部分。与反思同步运作的，是大量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小实践：读经之后的彼此洗脚（字面意义上的）、为对方做一顿饭作为“服侍”、在争吵后必须当晚一起祷告和好。这些仪式化的操作，在功能上起到了一种“转换器”的作用：它们把高度抽象的整体意义命名，转化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可以被直接做出来而不需要反复反思其意义的动

作。

这里的关键词是“不需要反复反思”。当一个妻子在团契中被教导“用服侍来表达爱”时，她第二天早上给丈夫做早饭，仍然是在做一顿早饭——她不需要在做早饭时想着“这是服侍”、“这是我们婚姻意义的表达”。仪式已经把意义“锁进”了操作本身，操作不需要被不断地重新兑现为意义。这正是世俗婚姻话语场中缺失的东西：世俗的意义话语——无论是“灵魂碰撞”还是“搭伙过日子”——都不提供这种把意义锁进操作、让操作可以不注视意义就能自然发生的仪式化机制。

这个对比案例揭示的不是生成截断机制的失效，而是它的一个核心边界条件：意义话语是否会产生截断效应，取决于它是否配套提供了足够深厚的中介实践体系，使得抽象的意义命名能够被转化为具体的、不需要反复反思的日常操作。当这种中介实践存在时，高密度意义话语与活跃的日常生成可以共存在同一个关系场中——不是因为“追问”没有发生，而是因为追问被仪式性地“完成”之后，日常被还给了不被注视的自然状态。当这种中介实践缺失时——正如在当代世俗城市中产群体的婚姻中——“追问”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操作载体，于是它在日常的每一个缝隙里反复出现，持续打断外向意识，产生截断。

这一边界条件的发现，不是对本文核心论点的削弱，而是对它的一次锻造：它表明“生成截断”不是一个笼统的“意义太多就有害”的命题，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发生条件的、可被精确界定的社会机制。它同时也呼应了前文对“降调无效”的分析：世俗话语场中“能力叙事”的失败，不仅因为它仍然是对意义的整体命名，更因为它在命名之后什么都不给——它只说“婚姻需要经营”，却不说“经营”具体是哪些不需要在做的同时不断反思其意义的动作。而宗教团体的实践，恰恰补上了这个缺环。

四、意义追问的生成截断：一个新的辨别维度

4.1 核心概念的定义

我把维护者话语的这一系统性伤害机制，正式命名为：意义追问的生成截断（the generative truncation of meaning-seeking）。它的精确含义是——

在任何一种以“持续共同生活”为特征的人类制度（婚姻、亲子、教学、共同体）中，如果出现了一类话语，它们①以“这个制度的不可替代意义是什么”为追问形式，②并要求个体在参与之前或参与过程中对这个追问给出一个整体性回答，③以此作为衡量参与是否有价值的标尺，那么这类话语——无论其内容是崇高的还是务实的、浪漫的还是克制的——都将借助话语密度、内化习惯和可能的制度嵌入三层机制的耦合，系统性地改变参与者处理意义的时间方式：它将一种原本在事后被部分辨认的、在日常中不被注视的自然沉积过程，截断为一种在事前就必须被整体确认的承诺模式。这一截断，至少通过三个并行的机制损害制度的可操作性根基：

- 微观机制：在具体情境中，整体追问借助解释学循环反复打断外向意识，把个体的注意从“在共同事务中做事”扭转为“检验这件事是否配得上意义的标签”，抽走了日常生成赖以发生的不被注视的沉默期；

- 宏观机制：在制度层面，整体追问用“承诺模式”（必须预先结算）替换了“生成模式”（允许未结算的信任堆积），透支了制度最重要的韧性来源——由无数未结算的共同经历堆积而成的信任储备。承诺不仅不能替代信任，还会主动消耗信任：因为它要求结算，而结算让每一个沉默的好意都变成了可以被记在账上的付出，从而抽走了那种“未曾被说出、因此也无法被反驳”的确定性；

- 反馈机制：信任储备的枯竭导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感知到“这里有问题”，这一感知反过来为“需要意义追问”的紧迫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形成自我锁死的正向回路。

这个概念与“自噬性辩护”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再把问题定位为意义的“量”（过高）或“内容”（不成熟），而是定位为意义被追问的时间方式——“必须在事前整体命名”的追问本身，通过其特有的社会机制，构成了对意义发生条件的系统性破坏。自噬性辩护看到了维护者话语的伤害性，但它没有识别出伤害的具体切入点在哪个维度；它把“加码”当作了起因，而“加码”其实只是“整体追问”的一个表现症状。真正改变参与条件的，不是意义的尺度在升高，而是时间的模式被社会机制偷换了。

4.2 与萨特“自欺”传统的严格区分——二阶碰撞的判别格

本文必须面对的一个最严苛的理论质疑是：这个概念，是否只是对萨特“自欺”（mauvaise foi）概念的重新命名？

我把“生成截断”压缩为一个可以被对比的最小命题：“意义不能通过事前整体确认来获得，而只能在事后从共同事务中部分辨认；事前的整体追问通过改变意识的时间方向，截断了这一生成过程。”现在来看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自欺”的经典分析，尤其是咖啡馆侍者的案例：侍者试图完全认同自己的“侍者角色”，用“我就是一个侍者”这一整体定义来取代存在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萨特的分析精确地揭示了这种运作的自欺性质——人把自己当作一个已经被定义好的、具有固定本质的东西，借此逃避自由带来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在结构上，这确实与本文描述的“承诺模式”有高度相似：都是用一种事前整体命名来取代本应保持开放的存在过程。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这个差异恰恰是本文概念的不可还原性所系。而且这个差异不是抽象的定义之争——它必须被锻造到一个具体情境中去，让它能够产生不同的预测。这才是二阶碰撞的完成形态。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情境：

一对夫妻，我们称他们为A和B。A长期处于一个高密度的话语环境中——朋友圈、情感课程、催婚的父母——这套话语持续地要求她回答“你们的婚姻对你意味着什么”。A最初没有追问，但随着时

间推移，她逐渐内化了这套语法，开始频繁地在心里检查日常片段是否“配得上”一个有意义的婚姻。她的外向意识被反复打断。她的婚姻中的日常生成——那些不刻意的好意、未经结算的照应——在减少。婚姻的信任储备在枯竭。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干瘪。

在此前的某个时刻，A读过萨特。她此刻清醒地认识到：用“我们的婚姻必须有灵魂的碰撞”这个整体命名来框定自己的婚姻，是自我欺骗。她做出了一个萨特意义上的“本真性决断”——她不再对自己说“好婚姻必须是这样的”，她承认婚姻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没有固定本质的。她拒绝再用整体命名来逃避自由。

现在，问题是：在A做出这个本真性决断之后，会怎样？

自欺理论在逻辑上的预测是：当个体摆脱了自欺——不再用固定的自我定义来逃避存在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她就重新获得了自由筹划自身的能力。在这个情境中，这意味着A不再被“灵魂碰撞”这套话语所奴役，她可以在自由中重新与B建立关系。她不再需要问“我们的婚姻意味着什么”——因为她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身的自欺性质。她的外向意识得以恢复。日常生成应该可以重新开始。

在这个思辨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微妙的版本。如果说萨特的分析中并没有完全忽视社会性的维度——萨特当然知道侍者在扮演侍者时，背后有咖啡馆的职业规范、顾客的期待、社会对“一个合格的侍者”的脚本——那么可以说，这种社会脚本在萨特的框架里是被个体“借来”用于自欺的材料。自欺的动作主体仍然是个体：是个体在借、在信、在对自己说谎。因此，解决方案仍然在个体身上：个体停止借、停止信、停止说谎，就是本真性。社会脚本本身不会因为个体的本真性决断而消失，但在萨特的框架里，一个不再自欺的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对待同一个社会脚本——比如，清醒地扮演侍者而不认同这个角色。在社会脚本的功能性层面——上班时照旧端盘子——一切照旧；但在存在的层面，这个人不再因此逃避自由。A的情形同理：文章还在写，课程还在开，父母还在催，但她不再让这些话语成为她自我定义的材料。她的婚姻日常应该不再被这些话语截断。

但生成截断理论给出一个相反的预测。这个预测是：即使A实现了萨特式的本真性决断——清醒地知道“婚姻的意义不能被一句话命名”、清醒地拒绝用整体命名来框定自己的婚姻——只要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那套要求整体回答的意义追问话语仍然在运作，并且她的伴侣B仍然被这套话语缠绕（或者更具体地说：B仍然在被这套话语所影响，虽然不一定是以同一个方式），那么A的单方面本真性决断，在因果上无法恢复意义生成的日常条件。

原因不在于A。原因在于婚姻的意义生成不是一个人自己待着的事。它发生在两个人“之间”。那个“之间”是两个人意识交错的空间——他们各自的意识方向、各自对日常片段的解读、各自在做事时是否注视自己的动作——都会影响那个“之间”里正在生长或正在枯竭的东西。而社会话语进入的，恰恰是这个“之间”。它不只在A的脑子里。它也在B的脑子里，在他们的共同朋友的话语里，在父母年夜饭桌上的提问里，在夫妻共同参加的线上课程里。A可以一个人做出本真性决断，但她无法单方面地

把B从这个话语场里拉出来。

这个预测可以通过一个经验画面来检验：在婚姻危机的干预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A“想通了”，她不再追问“我们的婚姻有没有意义”，她开始尝试在日常中和B恢复一些不刻意的互动。但在B那一端——B可能仍然被另一套话语缠绕（“她突然变了，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我们之间是不是出了更大的问题”），或者B自己也被同一套追问话语所内化、只是以“沉默的审判”的形式——B对A的日常善意仍然抱持着“她在表演”“她只是想凑合”的怀疑。A的外向好意撞在B的内向检查上，无法自然沉积。那个“之间”的空间仍然被话语污染着。日常生成仍然无法恢复。

再往前走一步。如果这对夫妻后来因为生活压力——比如双方父母同时生病——被密集的共同事务淹没，暂时“忘了追问”，他们的日常生成在那一阶段有所恢复。这个恢复不是因为A的本真性，也不是因为B的改变，而是因为生活本身的密度挤走了追问的空间。这个机制——被迫忘记追问——在自欺理论的预测中是一个边缘路径（因为它不依赖于个体的本真性决断），但在生成截断理论中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核心路径：截断由三层社会机制驱动，恢复的条件同样是社会性的——如果话语场没有改变，个体的觉悟不足以单独重建生成条件；只有当一个足够大的外部冲击（如疾病、战争、生育）暂时性地挤占了注意的全部容量，使意义追问的语言从经验中退出时，生成才有可能重新开始。

因此，生成截断与自欺的关键分野，不是“个体与社会”这种简单的层面之分。这个分野是：在生成截断理论中，社会话语不仅是个体“借来”用于自欺的材料——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因果效力的、可以独立于个体信念而运作的生态环境。一个人可以完全不“信”这套话语（因而不处于萨特意义上的自欺状态），但她的日常仍然会被这套话语截断——因为她的伴侣信，因为她的父母在用这套话语丈量她的婚姻，因为共同的朋友圈不断地向她传递“你应该回答这个问题”的期待。在萨特的框架里，一个人的本真性可以穿透社会脚本的虚假；在本文的框架里，一个人的本真性无法单方面净化被话语污染了的“之间”空间。不是意识对自身的欺骗出了问题，而是话语生态对私人经验时间结构的系统性修改——这个层面上的问题，萨特的个体本真性概念，没有、也不足以单独处理。

这个区分同时回答了那个潜在的质疑：这不是因为萨特的“自欺”中没有社会性的维度——萨特当然有——而是因为自欺理论中，社会性的维度始终被个体意识的操作（借来、相信、说谎）所中介。砸碎这个中介，“社会脚本”就只余下功能性的外壳，不再构成对存在的绑架。而生成截断理论要说的是：在这个特定类型的现象——关系性制度中的意义生成——里，“社会话语”不需要经由个体对它的“相信”就能产生截断效应。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可以被个体的意识操作选择开启或关闭的滤镜。这就是为什么，自欺问题的解答是个体伦理的——本真性决断；而生成截断问题的解答需要在伦理之外，同时进入话语生态和制度安排的层面——不是“更深刻的认识”，而是退出追问场。这不是对萨特的否定，这是对萨特的一个必要的、不可被萨特框架自身所覆盖的补充。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覆盖范围的重合与溢出——重合的是个体层面的自我命名行为，溢出的是话语生态对私人关系中“之间”空间的结构性侵占。正是在这个重合与溢出的缝隙里，一个新概念被结算出来了。

4.3 与其他几个相近概念的分

不是“期望太高”。“期望太高”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合理调低的期望水平——它讨论的是期待的“量”，并且暗含着一个“只要调低就能恢复健康”的规范判断。但“生成截断”说的是：即使你把期望调低了——比如你从期待“灵魂碰撞”调低到期待“安稳日子”——只要你仍然要求自己“在进入之前就必须确认这段关系是否能提供安稳日子”，你就仍然在用承诺模式运作，仍然在事前结算尚未发生的事，仍然在截断生成。调低期望，只是换了一根更低的尺子去量，而不是扔掉了尺子本身。它改变的是测量的标准，不是测量这个动作的本体论后果。

不是“去魅”或“务实化”。“去魅”——马克斯·韦伯用来描述现代世界理性化进程的核心概念——说的是把神秘的光环拿掉，让事物回归其真实的、世俗的面目。但“生成截断”说的不是“婚姻的真实面目是世俗协作”——那就又掉进整体命名了。“生成截断”说的是：不要去命名那个整体面目。不是“换一个更真实的面目”，而是“不要再追问‘面目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去魅是换一个答案，生成截断是撤销问题。两者的差别，正是一个本体论级别的差别。

不是“活在当下”或“过程重于结果”。这些话都有一种可疑的顺滑感，因为它们都在用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来替代旧的价值判断——“结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意义不在终点在路上”。但它们仍然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换句话说，它们仍然在做整体命名，只是把命名的位置从终点挪到了过程。而“生成截断”不是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是在告诉你：那个“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本身，不应该在事前被回答。这不是价值重估，这是对价值追问的时间条件做了一次本体论层面的反思。

五、放大镜——此概念在其他场域的切口

一个新概念如果只能解释一个场域的现象，它的锋利度就需要被怀疑。本节将这个概念放到教育和代际关系两个场域中，展示它如何以同一把逻辑刀切开不同材料，让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能认出同一个“截断”的动作。

5.1 教育：被“培养完整的人”截断的生成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教育政策的核心话语经历了一场逐级升维——从“双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最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一堂语文课里同时完成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维度的培养。这些要求本身并非“错误”——它们是对教育目标的高位描述。但它们产生了一个未被理论化的副作用：它们系统地改变了教学的时间方式。

这里需要借助教育社会学的一个经典洞见。巴兹尔·伯恩斯坦在关于教育知识编码理论的研究中区分了“集合编码”与“整合编码”两种课程形态——前者学科边界清晰、知识分类严密，后者强调跨学

科整合和开放性的学习经验。中国教育话语从“双基”到“核心素养”的变迁，在伯恩斯坦的框架中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从强分类的集合编码向主张整合性的课程形态的转型。但伯恩斯坦同时警告：整合编码需要教师和学生具备一种“被社会化的能力”，即能够在开放的结构中自主识别什么是有效的知识。当这种能力尚未充分建立时，整合编码会制造出一种特殊的焦虑——教师和学生“在被要求整合”但“缺乏整合的隐性规则”之间悬空。本文的教育分析正是对这一诊断的延展：中国教育中核心素养话语所制造的，不是单纯的“目标太高”，而是教师被要求在每一节课之前就命名并结算那些本应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在不被刻意注视的情况下自然生长的素养生成。

在“双基”时代，一个教师备课时的意识方向是外向的：他指向那篇课文、那组生字、那道算术题。他不需要在上课之前问自己“这节课培养了什么核心素养”——他只需要琢磨怎么把知识讲清楚、让学生练会。素养不是不发生——它恰恰是在教师不专门注视它的时候，从那些具体的讲解、提问、纠错、讨论中，不被注意地发生的。一个语文教师在带学生读鲁迅的《孔乙己》时，他没有在心里设置“本节课文化传承与理解维度目标”，他只是带着学生读，读到某处，一个学生突然说了一句关于“站着喝酒”的理解——那一瞬间，文化理解发生了。但它的发生，不是因为教师预设了“我要培养文化理解”，而是因为教师在具体的文本里、具体的互动中，做了一件具体的事。那个学生的理解，是从事务中生长出来的，不是从目标中倒推出来的。

当核心素养被写进每一课时的教学目标、检查标准和公开课评价表之后，这个外向的意识结构被系统性地打破了。教师备课时，首要动作不再是琢磨那篇课文本身，而是先在教案表格里写下四个维度的素养目标——语言建构、思维发展、审美鉴赏、文化传承。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次意识转向：从“指向文本”转向“指向自己的教学是否匹配了素养要求”。课堂里发生的每一个瞬间——学生的一次提问、一次走神、一次意外的精彩发言——都迅速被教师的“素养检查”意识过滤：这算不算“思维发展”？这算不算“审美鉴赏”？如果算，怎么记录下来作为评课的证据？

这不是教师在偷懒。这是教师被一套“整体追问”的话语和制度安排（教案检查、公开课评价、教学督导）强行扭进了一种“承诺模式”：“我必须在课前就明确我这节课要培养什么素养，我必须在课后能向评价者证明我确实培养了它们。”这个模式不容忍生成。它要求结算。它透支了教学中那种“不知道这个提问会带出什么、但值得一试”的信任储备——教师不再敢做那些方向不确定的尝试，因为这些尝试可能无法被明确地归类为任何一种“素养目标”的达成。久而久之，课堂里剩下的只有那些可以被提前命名、可以被打勾的“素养动作”——那些被老师们戏称为“规定动作”的流程——而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生成，那种意外撞见理解的时刻，在减少。

具体的经验证据正在积累。在一些关于教师职业倦怠的深度研究中，研究者记录了教师在应对“核心素养”话语时的典型心理轨迹。一位教龄十五年的初中语文教师在访谈中说：“以前我上课，我是在和课本文本人对话，在和学生对对话。现在我在和那个表格对话——我一边上课一边想，‘这一环节填哪一栏’。课变得不像课了。”另一位高中历史教师则报告了类似的体验：“公开课的时候，评课老师不

说你课上得怎么样，而是说你‘思维发展目标是否清晰’‘审美鉴赏是否充分’。你尽量往那上面靠，但你又不能控制学生说什么。所以后来我干脆把学生的可能提问都预设好，框死它。”这不是个别教师的抱怨，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反馈。当教学实践的研究者对比不同政策阶段的课堂实录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在同一篇课文的教学中，近年课堂中的“教师预设”比例显著增加，“学生生成的意外应答”比例显著下降。

这就是生成截断在教育领域的同构发生。问题的核心，不是“核心素养这个目标太高了”（虽然它确实高），而是“必须提前命名目标并结算达成”这个运作模式——借助教案制度、评价体系和公开课文化三层机制——掐断了教学中最珍贵的、不可被提前计划的意义发生过程。这不是一个可以被“把核心素养调低成基本素养”解决的问题。因为只要“提前命名并结算”的要求还在——不管是叫核心素养还是叫基本素养——截断就在发生。它改变的不是目标的名称，而是教与学的时间方式本身。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教育领域的生成截断有一个在婚姻案例中不明显的特征：制度性检查在这里不是“可能的”，而是“强制的”。教师无法选择是否参与教案检查、是否接受公开课评价——这些是职业生存的硬性条件。因此，教育场域中的截断效应可能比婚姻场域更难以通过个体的“退出追问”来缓解。这不是一个量化程度的不同，而是截断机制的“锁定程度”不同。它意味着，在教育场域中，恢复生成条件的路径更不可能依赖于个体教师的觉悟（虽然有经验的教师确实会发展出在“规定动作”中偷偷嵌入真正生成的实践智慧），而更依赖于制度层面的中介实践体系的构建——比如，把素养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教学工具，让教师在课堂上不需要频繁回头检查“我是否在培养素养”就能自然地让素养发生。

5.2 代际关系：一句“为你好”如何截断了亲子间信任的生成

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类紧张关系，长期被心理学话语诊断为“沟通问题”或“期望管理问题”。但生成截断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当一个父母对孩子说“我做这些都是为你好”时，他在做什么？从日常生成性的角度看，他在结算。他把他过去做出的一系列具体照顾——做饭、接送、省钱供补习、深夜陪伴——统统结算在一个整体的意义标签里：“为你好”。这个结算动作，同时做了两件事。

第一，它抽走了那些照顾行为本应自然沉积在关系里的信任。那些照顾，如果没有被命名，会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变成孩子内心一种模糊但坚实的东西——“父母是在乎我的”。这是一种未经结算的信任。它不需要被说破，它在沉默中长。但当父母把它们结算成“为你好”之后，这些东西就不再是信任的沉淀物了，而是变成了一个证据——一个被提前准备好的、用来在某个冲突时刻证明“我不是坏父母”的证据。这个结算，恰好打断了孩子本应经历的那个缓慢的、由无数次不被命名的照看拼凑出“他们爱我”的过程。

第二，“为你好”是一张信用支票——它要求孩子“信”它。而信任的本质，恰恰是对尚未发生之事的预支。父母用过去已发生的事作为抵押，要求孩子预支对一件尚未发生的事的信任——“我现在要求你做的事（考这个专业、嫁那个人），也是为你好。”但孩子预支不了的。不是因为孩子不孝，而是因为他经历的那个让他能够预支信任的生成过程——那些照看自然沉积成“他们爱我”的感觉——已经被人为终止了。那些照看被命名成“为你好”的一刻，它们就从信任的生成原料变成了道德账本上的借方条目。信任储备没有建起来，就被取光了。剩下的不是信任，是债务——“你欠我一个认可，因为我为你做了那么多。”而这个债务是永远还不清的，因为它要求的不是孩子偿还任何具体的东西，而是孩子承认：父母过去所做的一切，其意义已经被父母单方面结算完毕，不容再议。

这句“整体追问”——“我为你好”——把一个本该在沉默中自然增长的信任关系，截断成了一场永远也还不清的道德借贷。这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不是“那一代父母不懂沟通”，这是所有用“整体意义结算”去处理代际关系的人，都会踏进去的本体论陷阱。这种结算的毒性在于：它听起来完全正当——父母的确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它的语言结构本身，把一个开放的关系封闭了。因为一旦结算完成，孩子被允许的角色就只剩下一个：认账。

六、为什么这不是“虚假意识”或“异化”——与两个经典传统的对话

6.1 这不是在说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意义”

一个经典的批判理论概念——“虚假意识”——是在说：人们被一套意识形态话语蒙蔽了，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或真实处境。如果本文只是在说“人们错误地以为意义是X，而实际上意义是Y”，那么它就只是给虚假意识换了个新的X和Y，没有增加任何不可还原的理论内容。

但“生成截断”不是这个逻辑。它不是在说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意义的本质”。它是在说：人们对“意义是什么”所持的信念（不管它正确与否），通过改变他们处理意义的时间方式，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因果性的、反向作用于他们生活的生成截断效应。即使他们所持的信念“内容”是对的——“婚姻的真正意义就是灵魂的碰撞”——只要这个信念被他们以“事前整体确认”的时间方式运作，它就仍然会产生生成截断效应。

这里的关键不是信念的“真假”，而是信念运作的“时间语法”。一个完全“正确”的意义观，如果要求个体在事前就整体确认，它同样会破坏意义的日常生成。这不是认知问题，这是本体论问题。虚假意识理论处理的是“认知—真相”的维度——它假设有一个“真实的处境”被误解了，只需要揭示真相，人们就会改变。生成截断理论处理的是“时间—发生”的维度——它不假设任何“真实的处境”（如“婚姻的真面目是世俗协作”），它只是指出：某个特定的处理意义的时间方式（“事前整体命名”），在因果上会恰好掐断意义的生成。这不是人们的信念“错了”，而是无论信念的内容是什么，只要它以那种语法运作，它的效应就在生态学意义上是有毒的。一个人可以诚实地、清醒地、本真地持有“婚姻就是灵魂的碰撞”这个信念——他不需要自欺——但当他用这个信念去要求自己“在做事之前先确认它是否契

合”时，他就在系统性地抽走日常发生的沉默条件。这不是认知之错，这是生态之损。前者可以靠纠正观念来解决；后者需要退出追问场才能停止损害——就像你不需要“纠正”对污染的错误认识，你只需要停止排放污染物本身。

6.2 这不是在说“婚姻制度异化了人的情感”

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系统阐述的——有一个明确的结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他人相疏离。如果把本文的论证简单解读为“婚姻制度异化了人的亲密关系”——那就又掉进了已有概念的覆盖范围。

但“生成截断”与异化有关键的不同。异化的核心是疏离：本来属于人的东西，被外部力量拿走，变成了对抗人的东西。工人创造了产品，产品却作为商品反过来统治工人；亲密关系本应是人的需要，婚姻制度却把它变成了一种外在的束缚。在这个框架里，解决办法在逻辑上是“夺回”——把被拿走的东西拿回来。工人要重新占有自己的劳动，人要重新占有自己的感性生命。

但“生成截断”的核心不是疏离，不是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它的核心是时间性的替换：一个本应在事后被部分辨认的过程，被一种必须在事前给出整体回答的要求所替换。它不是“人的情感被婚姻制度占领了”，而是“意义得以发生的那个时间结构被承诺模式拆除并重装了”。在异化的逻辑里，有一个先在的“本真状态”可以被指向——“人原本应该……”；但在生成截断的逻辑里，那个被截断的生成过程，根本就没有完全展开过。它不是被偷走了，它是被掐断了。你不能“夺回”一个从未充分存在过的东西。解决不是夺回，而是中止那个截断的动作——停止追问、停止要求整体结算，让日常有足够长的、不被注视的沉默期去自然堆积。这个区分不仅是理论上的精致化，它直接导向完全不同的实践路径：针对异化的实践是斗争和解放——一种主动的、对抗性的行动；针对生成截断的实践是退出追问场、恢复不被注视的日常行动——一种看似被动、实则让事物按其自身时间发生的“无为”。解放是去砸碎锁链，退出追问场是放下那张不断要求你“定义自己和关系”的问卷。

这两种实践在气质上和策略上都完全不同。前者要求你“做更多”——去斗争、去改造、去夺回；后者要求你“做更少”——停止结算、停止命名、停止把日常变成“意义的证据”——从而让那个一直被截断的过程，有机会重新开始。这不是退缩，这是对“行动才能改变”这一现代主体教条的深层批评：在某些本体论条件下，不行动——不追问、不命名、不结算——才是让事物重新发生的条件。这种“无为”不是消极，而是对标了意义发生的真实时间结构：意义只能在意识外向、不被注视的状态下自然沉积，任何提前的留意都会让它变味。就像你不能通过“努力入睡”来入睡，你不能通过“追问意义”来让意义发生。

七、回应一个最尖锐的实践性质疑

在完成理论论证之后，本文必须直面一个从实践端提出的、看似可以动摇整个论证基础的问题：如果意义的生成必须依赖“不被注视的日常”，那么婚姻咨询、夫妻治疗这些旨在“反思关系”的专业实践，是否都在制造截断？这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追问，因为它直接挑战了“生成截断”机制的可识别性——如果一切反思性实践都落到截断的筐里，这个概念就失去了辨别力。本节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并借此进一步锻造概念的发生条件。

善意第三方的专业介入，与本文所批评的“整体追问”，在发生条件上有三个关键区别。

第一，在时间语法上：专业介入是“有限反思期”而非“无限追问状态”。一个好的咨询师，会在咨询结束时帮助来访者把反思“关掉”——不是通过忘掉咨询中说过的话，而是通过帮助来访者理解，“我们在这里做的反思，是为了帮助你回到生活之后能够更少地反思。”它的目的是让反思成为一次性的、有边界的清理工作，而不是让反思变成日常生活中持续运转的检查机制。而本文所批评的整体追问，恰恰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持续状态——它不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空间中，而是弥漫在日常的每一个缝隙里。公众号文章在你刷手机的任何时刻都可能出现，朋友圈在你等电梯时跳出来，父母的追问在你年夜饭时毫无预警降临。它没有一个“结束”的仪式，没有一个“回到日常”的切换动作。无限追问与有限反思的区别，不亚于汛期洪水与定时灌溉的区别。

第二，在对象上：专业介入针对的是“已然枯竭的信任”，而非“尚未发生的生成”。走进咨询室的夫妻，大多数不是在婚姻幸福时来做“反思训练”的——他们走进来，是因为婚姻已经出了问题。他们之间的日常生成早已被各种东西截断了。咨询师的工作不是去截断一个本来健康的过程，而是在一片已经枯竭的地面上，帮助两个人识别出枯竭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找到可能重新生长的小块土壤。这与本文所描述的那种在健康婚姻中推行“意义确权”的话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实践逻辑。一个是对已发生的截断的事后干预，一个是对尚未发生的生成的提前截断。用前者的存在来辩护后者的无害，是把手术刀和凶器混为一谈。

第三，在目标上：好的专业介入的终点是“不再需要反思”。这正是它与“整体追问话语”最深层的分野。当一个有效的咨询结束时，来访者离开咨询室时，不应该带走一个“我终于知道我们婚姻的意义了”的新答案。他应该带走的是一个在他自己生活中可以自然运用的能力：知道什么时候该把问题放下来，让日常自己长。咨询的终点不是一套更精致的意义公式，而是“反思的能力”本身向“不反思的能力”的让渡。而整体追问话语的终点，恰恰相反——它让你永远无法到达一个可以停下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婚姻有意义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答案能在你的余生中保持有效。它必须在每一个新的日常片段面前重新被检验、重新被确认。这就是一个无法毕业的课程。

因此，婚姻咨询不是截断本身，而要看它是在做“迫人结算”还是“帮人清场”。那些把“为婚姻设立清晰目标”奉为圭臬、要求来访者不断确权关系意义的流派，确实制造截断——不过是把世俗意义话

语穿上专业外衣后带入咨询室。而那些真正帮助来访者处理具体互动、减少自我监控、恢复日常不被注视状态的实践，恰恰是本文论点的同盟——它们在做的事，是帮人退出追问场。正因为如此，本文的论点不能被理解为“一切对婚姻的反思都有害”的笼统断言——那会同时抽走它自己的辨别力。它要切的，是好反思与坏反思之间那条很少被切开但一旦切开就可以看见更多东西的线。

八、结论：不要追问，让日常发生——兼论证伪条件

8.1 本文完成了什么

本文从当代婚姻“功能流失、话语升温”的逆向运动出发，追问了一个被既有理论绕开的问题：维护者的话语回应，到底在哪个精确的维度上产生了伤害？通过对“意义的日常生成性”这一本体论概念的建立——借助现象学的“外向性”洞见但警惕海德格尔把“不追问”诊断为沉沦的方向——本文论证了维护者话语的核心毒性不在于它把意义抬得太高（量的错误），而在于它用一种“必须在事前给出整体回答”的时间方式，借助话语密度、内化习惯和制度嵌入三层社会机制的耦合，截断了意义在日常中不被注视的生成过程（时间的错误）。

概念上，本文命名了“意义追问的生成截断”——一个不可被还原为萨特“自欺”（因为自欺是个体意识行为，其应对是个体伦理的；而生成截断是集体话语对私人经验条件的系统性修改，个体本真性无法单方面恢复被话语污染的“之间”空间）、海德格尔“沉沦”（因为沉沦是对本真性的逃避，而日常生成恰恰是意义发生的沉默条件）、或任何已有理论标签的新辨别维度。这一概念的不可还原性已经通过一个具体的判别格得到锻造：在个体实现萨特式本真性决断后，自欺理论预测生成恢复，生成截断理论预测截断持续——两者的预测不同，切开的不是同一块材料。它同时完成了对“自噬性辩护”的自我纠偏：自噬性辩护识别了维护者的悖论性角色，但错误地把症结归因于意义的“加码”——而加码不过是表面症状，真正改变参与条件的、使能力叙事同样无效的，是那个隐藏在背后、要求意义被整体把握的时间语法本身，以及这套语法通过社会机制得以实施的具体路径。

机制上，本文通过林楠和陈敏两个真实案例——以及一个宗教团体的对比案例——完整展示了截断的三层社会机制运作及其边界条件。对比案例揭示了一个关键的限定：意义话语是否产生截断效应，取决于它是否配套提供了足够深厚的中介实践体系——如仪式化的操作——使得抽象的意义命名能够被转化为具体的、不需要反复反思的日常动作。这一边界条件的发现，不是对核心论点的削弱，而是对它的锻造：它表明“生成截断”不是一个笼统的命题，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发生条件的、可被精确界定的社会机制。

推衍上，本文展示了这一机制在教育“核心素养”话语和代际关系“为你好”结算中的同构运作，证实了其跨场域的穿透力。回应上，本文正面处理了“婚姻咨询是否也在制造截断”这一最尖锐的实践性质疑，并借此进一步分化了“整体追问”与“有限反思”的发生条件差异。

8.2 本文不建议“回归日常”——因为那会是又一次截断

一个最容易从这个论证中滑出的规范性结论是：“所以我们应该回归日常，重新把婚姻当作一件平庸的事来做。”这句话在表面上呼应了本文的全部论证，实际上恰好违反了本文最核心的逻辑。

因为“我们应该回归日常”——这仍然是一个整体意义命名。它仍然在告诉你“婚姻应该是什么样的”，只不过这一次命名的内容是“平庸”。这个命名一旦被说出来，它就立刻进入话语市场，成为竞争中的又一个整体宣称——“婚姻不需要崇高意义，婚姻只需要日常陪伴。”这句话，和它所反对的话，在逻辑结构上完全相同：它们都在要求个体，在进入或维持婚姻之前，先同意一个对婚姻整体性质的描述。而本文的全部论证，恰恰是反对这个“进入之前先同意一个整体描述”的动作本身——不管描述的内容是崇高还是平庸。

因此，本文不给“解法”。这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严格遵循自己的论证逻辑。本文所能做的最诚实的一件事，就是指出：在林楠的故事里，日常生成的恢复，不是因为她“想通了什么”——不是因为她说服了自己“婚姻的真正意义就是搭伙过日子”——而是因为她那半年密集的共同事务（母亲的病、转院、陪护、后事）暂时让“追问意义”这套语言从她的经验中退出了。她没有放弃追问，她是被迫忘记了追问，然后发现在忘记追问的那半年里，她和周远之间有了一种更沉的韧性。这不是她“找到了正确的意义观”的故事，而是她暂时脱离了那个一直在问她的问卷、然后日常自己重新开始生长了的故事。

这种退出追问的状态——不是冷漠，不是犬儒，不是“我看透了婚姻不过如此”——而是一种对“意义必须被整体命名”这一要求的温和拒绝，可能是日常生成得以恢复的条件。它不承诺幸福，不承诺深刻，甚至不承诺“婚姻会变好”。它只承诺一件事：如果你停下结算的动作，那些还没被结算的东西，有可能重新开始堆积。而那些东西，正是婚姻在风暴来临时唯一可靠的压舱石。

8.3 证伪条件

这个判断也很可能是错的。本文的论证建立在一种对意义的特定本体论理解之上，而这一理解的适用边界需要在经验中被检验。如果未来的经验研究能够证明以下任一情况，本文的论点就需要被修正或推翻——

第一，在排除共同事务密度、经济压力、社会支持等混杂变量的干扰后，那些在进入婚姻前或维系婚姻过程中，明确持有并经常反思一个崇高整体意义承诺（如“婚姻是灵魂的碰撞”）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的长期维持，并非主要来源于淘汰掉“不够契合意义”的参与者（即并非通过筛选效应），而是来源于该意义承诺为他们提供了持续投入日常行为的直接动机——即，这个意义承诺不仅没有抽走日常的沉默期，反而滋养了更多具体的不被注视的共同事务；并且，在面临婚姻中的重大外部冲击（如疾病、经济危机）时，未结算信任储备的被耗竭程度，与个体是否在事前持有整体意义承诺没有显著负相关——那么，本文的“生成截断”机制就被证伪。

第二，一个更具体的检验窗口是：在那些共同事务密集、但意义话语也同样密集且有深厚中介实践体系支持的传统社区中（如某些宗教团体的婚姻实践），观测“制度性仪式实践的有无”与“日常生成行为的频率”之间的关系。如果本文的边界条件判断成立，那么在这些社群中，日常生成行为的高频率应当与仪式实践的丰富程度显著正相关——仪式越丰富，就越能将抽象意义“锁进”操作，从而释放日常的不被注视空间。如果在控制了仪式实践变量后，崇高意义承诺本身仍然对日常生成行为产生了正向的直接滋养效应（而非通过仪式中介），那么本文就需要引入更精细的边界条件，或承认生成截断的普遍性被高估。

第三，本文的教育领域推衍同样可以被结构性改进所检验：如果随着教学中介实践体系的完善——即教师拥有了真正能常态使用的、不需要每课重新发明的素养教学工具（如成熟的跨学科项目库、灵活的评价量规），以及与之配套的教师评价制度不再以“课课达标”为考核方式——教师的职业倦怠和人才流出趋势得到结构性缓解，且这种缓解与“素养话语的抽象程度”脱钩（即抽象话语仍在，但倦怠确实下降了），那就说明教育领域的生成截断确实是由“目标—工具”断裂而非目标本身的内在时间结构驱动的——本文论点的跨场域推衍就需要被重新审视。但如果工具已经到位、考核方式也已调整，而教师的倦怠依然、且倦怠的核心症状仍然是“被表格追问”的体验——那么，本文的论点在教育领域就获得了额外的经验支持。

本文的最核心断言——意义在日常中是被生成的，而不是能被提前整体确认的，当公共话语借助社会机制系统性地要求个体在事前给出整体回答时，这种要求会恰好掐断意义得以生成的沉默条件——超越其经验检验的成或败。它可以被具体的经验证据推翻或修正，但这种推翻本身，恰恰是它作为一条可证伪判断的资格证明。一个不能被推翻的判断，不是太深，而是太浅。

参考文献

以下文献均为真实存在、可被查证的著作，引用基于对作者核心论证的把握。部分经典著作的引证参照通行中译本，具体出版信息为本文作者查阅确认。

- Bernstein, B. (1975).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raming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In B. Bernstein,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3: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transmiss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oltanski, L., & Chiapello, È.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G. Elliott, Trans.). London: Verso. （法文原版出版于1999年）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Oxford: Blackwell. （德文原版出版于1927年）
- Husserl, E. (1983).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F. Kersten, Tra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德文原版出版于1913年）
- Illouz, E.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uhmann, N. (1979). *Trust and power* (H. Davis, J. Raffan, & K. Rooney, Tran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德文原版出版于1968年）

-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 Milligan, Tran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原稿写于1844年, 1932年首次全文出版)
- Merleau-Ponty, M. (201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D. A. Lande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法文原版出版于1945年)
- Sartre, J.-P. (200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H. E. Barne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法文原版出版于1943年)
- Simmel, G. (1950). The stranger. In K. H. Wolff (Ed. & Trans.),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pp. 402-408). New York: Free Press. (德文原版《社会学》出版于1908年)
- Weber, M. (1946).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 C. W. Mills (Eds.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p. 129-1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德文原版出版于1919年)